



●畢飛宇接受訪問。

樂觀主義者的寫作持久戰



盛夏時節，茅盾文學獎得主、著名作家畢飛宇帶著睽違十五年的長篇新作《歡迎來到人間》作客第36屆香港書展，並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訪問。畢飛宇對香港書展有一種特別的感情，他還記得第一次到香港書展時，他幾乎不相信那麼多的人逛展，卻如此地井然有序。「每個人的臉上都有非常祥和寧靜的表情，很緩慢，帶着家人和孩子。」也是在香港書展，他第一次感受到：「閱讀是一種日常」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

新作《歡迎來到人間》的寫作，是畢飛宇迄今為止最漫長的跋涉。有讀者在社交媒體上寫道：「這本《歡迎來到人間》，是畢飛宇老師的15年，是他數十次想要放棄的噩夢，哪怕如今提起，他臉上依舊瀰漫着掙扎與痛苦。」但實際上，畢飛宇透露，這部小說的真正起點是2005年。

「我必須完成」

畢飛宇透露，「最初動機，就是想寫一個醫生。」他形容這是一個「好好的，讓整個社會裏所有的人都覺得他好」的醫生。但恰恰是「當他讓所有人都知道他好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出了問題」。主人公靠着醫生的慣性對每一個人關心，最後連他的太太都不知道他出了大問題。這樣的人物構思，自然地指向了「功績社會」下的現代性之傷與救贖之難，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的念頭在他心裏扎了根。但畢飛宇對醫學一竅不通，他得從頭開始準備，到病房裏去了解和醫療有關的、具體的一切。有評論指出，畢飛宇的寫作一向建立在扎實的田野與專業經驗之上，為了呈現腎移植的細節，他曾在醫院做見習，幾乎每日跟隨醫生。準備完了，開始寫、推翻，推翻以後再往下走，發現又走不下去，「所以後來全部推翻，只留了一章」。而那一章，是他在作品《推拿》之前就早已寫好的。

41歲埋下的創作念頭，到終於完成、付印之年已經步入花甲，畢飛宇對於這樣漫長的時間投入並不覺得需要下多大的決心：「因為我必須完成。這個信念從來沒動搖過，但凡動搖一次，這個小說就沒有了。」畢飛宇說。究竟在十五年裏，他有過多少糾結、下筆又重來多少次，都沒有影響他想要「完成」的慾望，他的信念和行動一樣堅決：「我寫的小說一定不平凡。」

《歡迎來到人間》中講述的被动成功者的痛楚和崩壞，當與世界碰撞出凌亂的、接近病態的故事與事故時，「人間」的真實面貌才徐徐展開。這種對於社會複雜性的觀察貫穿於畢飛宇的創作，他尤善探討人性下的權力關係，並

鋪展為具有獨特性的故事。這種創作角度很難說不與他個人頗為黑白分明的性格有關，正是因為曾感受過若干的人間「刺」，才更願意將這一根根刺拔出來，把面貌描摹開去。對於初出校門的年輕人在經歷社會化過程中的陣痛和無助，畢飛宇表現出格外的理解：「熬過去。」這樣的議題，在他個人的人生中也在反覆出現，「我年輕時候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。」他十分坦白，「甚至有一個時候進入瘋狂，不管你怎麼說、怎麼做，別人都覺得你不對。但你得熬過去。」他形容，「當一個人走向生活的時候，最後無非就是與他人和解的過程。」他同時強調一種特別的責任心：如果你決定做父母，那麼還是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孩子的社會化。

「就是要做一個小說家」

少有人知的是，畢飛宇在以作家成名之前還做過多年記者，他形容做記者的日子讓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想寫作的到底是什麼。「我不適合寫新聞。」他回憶，當時每當他出去採訪，「滿懷信心地去面對具體的人和事，無論準備和採訪過程多麼充分，回到辦公室我仍然寫不出來。」甚至領導都下了殘酷的結論，「你不會寫東西。」畢飛宇只覺在三維的現實世界裏，他總是抓不住重點。但在虛構的世界裏，一切都不一樣了。當他放肆地去想像一個人、一件事的時候，他能更準確、更完整地把它寫出來。寫小說對他而言，似乎更「容易」。這樣的感覺不是第一次出現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社會中的人文浪漫氣息也影響着畢飛宇。那時候最流行的是「寫詩」，畢飛宇笑說，「年輕的時候肯定是想衝着最高端的去，去做詩人。」讀大學時，畢飛宇也成為學校詩社的社長，不斷發表詩歌作品。可是終歸到底，畢飛宇發現自己寫的詩達不到自己的期待。他謙虛自嘲，「寫詩這高端的事做到最後很痛

苦、很內耗，怎麼辦？就降低要求了，決定寫小說。小說一寫，也覺得很容易。」這讓畢飛宇發現了某種人生真相，「當你發現做某件事情很容易的時候，你的才華點就在那裏。你覺得很難，費了老勁去弄，就反而達不到。」

他下了決心，「我就是要做一個小說家。」現在回頭看，「小說家」這樣的目標對於畢飛宇實在不是什麼難題，他也經常受到各種獎項的青睞。1998年，他憑藉小說《哺乳期的女人》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；2004年，剛步入40歲的畢飛宇憑小說《玉米》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。又七年後，畢飛宇交出了長篇小說《推拿》，這部作品不僅讓他一舉斬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，改編自該作的同名電影《推拿》更橫掃了多項國際電影大獎。才華和對才華的認可似乎像水一般追隨着他，訪談間被問起對「得獎」這件事的態度，畢飛宇答，「沒有人不喜歡得獎。」但多項重量級文學獎盡入囊中，並沒削減畢飛宇對於繼續「寫下去」的渴望。

在成為「小說家」的路上，畢飛宇確有自己的審美和信念。他拒絕成為「職業作家」，不想在創作中摻雜任何可能為「謀生」而做的成分：「我希望有一份職業，保持在業餘寫作的狀態。」因為「業餘」、因為「不以此為生」，反而會少些包袱，而只寫自己真正想表達的，「一定是我覺得我一定要寫完，把它寫完對我人生很重要，我才會寫。」他毫不掩飾自己對於寫作的信念，「就這麼說，即便我一個作品都沒有發表，我依然對自己的未來很有信心，無非就是我知道將來自己會是什麼樣的人。」畢飛宇對於未來有一種屬於寫作者的樂觀，「我還會有更好的作品。這種情況就算一直沒來，但總會不停地把你往前推。因為我一直在寫。」

●《歡迎來到人間》這部小說的真正起點是2005年。



「身體」與「寫作」

對畢飛宇來說，能夠持續寫下去的唯一的動力，是自己「還有更好的作品」「還有東西沒有表達」。畢飛宇透露，自己下一部小說可能會以「身體」為主題。畢飛宇對「身體」有深刻的理解。年少時，畢飛宇曾迷戀踢足球，成年後他也保持着踢球的習慣，直到搬家之後，足球場不那麼容易找到了，他就從1999年開始健身，至今二十多年。「寫作」也像健身一樣塑造着他整個人的質地。「我在沒有寫作之前，是一個脾氣非常暴躁的人，幾乎不能學會忍讓，個性非常強，是寫作這個事情讓我變成了一個更好的自己。」他回憶在寫作小說《平原》時，正處於他身體力量的上升期，他用了將近四年的時間進行純粹的健身和寫作，那段時間的幸福畢飛宇至今難忘，「彷彿進入了第二個青春期。」

「身體一切的開始。」畢飛宇形容，他對身體的認知在於人的「整體性」，包括人的外觀、智識、生長、創造和衰老的一切。言談中，畢飛宇時刻透露對於「人」存在本身的某種敬畏。這種態度也和他對人工智能的看法保持一致，他說，「我不會把我最愛的工作，讓AI替我幹，無論帶給我多大的便利，只要我還有一口氣，就不可能用別的方法來寫作。」他承認，科技在改變人，包括交際方式、思維模式，但他最深的擔憂是人類被科技改變審美方式。「當審美被改變時，就意味着社會的變化最終完成。」對作家來說，這種變化既恐懼又亢奮。「恐懼是因為我們不願看到生活的變化，亢奮是因為我們看到新的可能。對作家來講，這是最大的誘惑。」但誘惑歸誘惑，畢飛宇認為，「小說是虛構的，作家和讀者可以在虛構的世界裏進行密切的交流，精神上達到很深的契合。」這是AI永遠無法取代的。

畢飛宇：歡迎來到人間

►畢飛宇以「小說，這個遼闊的世界」為題進行分享。
香港書展展圖

一部航海時代的中美交流史

●文：李雅言

書評

踏入二十一世紀，中美關係成為了世人的焦點，因為它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——且看非中美傳媒對其報道的篇幅便可知。但有誰會記得，中美貿易對美國這個新世界國家的早期發展，亦有着不少影響？

美國獨立的導火線，是英國皇室向其北美殖民地居民強行徵收茶葉稅的政策。政策嘗試杜絕私人茶葉貿易，迫使居民向由政府控制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購買課稅茶葉。憤怒的美國人把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傾倒進波士頓港口，為美國獨立戰爭揭起序幕。茶葉自哪裏來？當然是中國，其時中國茶已經不只在英國本土，亦在仍為英國北美殖民地的美國風行。按本書引用的估計，殖民地平均每人每天飲用1.4-1.6杯茶！美國於1783年取得獨立後，當務之急是奠定其經濟基礎，這並不容易，因為美國已經不再屬於英國商貿圈。大膽的美國商人便在想：為何不直接跟中國打交道？翌年，「中國皇后」號（Empress of China）便從紐約起航，成為第一艘赴華貿易的美國商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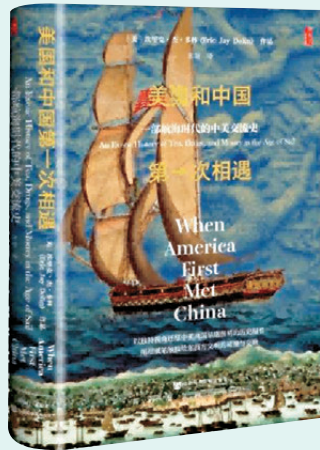
「中國皇后」號的成功，鼓勵更多的美國商人踴躍加入市場，而政客也覺得往西擴張會令美國繁榮強大。作者精闢地指出，《國富論》作者雖為英人，但「將他的理論極極付諸實踐的卻是美

國人」，「通過高度競爭的自由貿易獲取了驚人的利潤」。成為美國第一個百萬富翁和第一個千萬富翁的商人，都是由此發財。（注：千萬富翁為「對華貿易王子」阿斯特，紐約大學旁的阿斯特廣場便以其命名。）對華貿易並產生了連帶的社會影響：「通過種種方式遍及美國。資金被用來造船、配置設備和人員、納稅以及在全美各地大量買賣貨物，這些使得經濟競爭力大為提高。勃興的對華貿易幫助美國站穩腳跟，捍衛自己的海上權益，並培育出商人和海軍都可仰賴的優秀海員，俾以發展和保衛國家」（頁93）。

問題是，美國以什麼貨物和中國交易？最初是銀幣和花旗參，還有的是海豹皮、海獺皮和檀香。為了搜羅後三者，美國商人到處跟「土著」進行剝削性的交易：除了今美國西北部地區原住民之外，還有阿拉斯加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居民。（夏威夷首都檀香山便因曾經盛產賣往中國的檀香而得名。）但畢竟中國是個自給自足的龐大經濟體，美國跟其他國家的對華貿易一樣，一直存在逆差。於是美國商人便仿效了英商，向中國販賣鴉片，儘管美國國內不少人覺得鴉片貿易存在道德問題。（引用歷史學家唐斯的說法：「對華貿易商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精明企業

家。他們來到廣州是為了尋求財富，在中國不擇手段，回到美國後再拾起道德」，頁210）。美國企業家的「精明」，讓他們在林則徐下令禁煙後並沒有按英人要求一起撤退廣州城，而是向林承諾遵守禁煙令後繼續跟中國經商，且順水推舟，轉賣已不能再跟中國貿易的英商的貨物而獲利。清廷跟英國簽署了喪權辱國的《南京條約》後，美國向清廷要求得到同樣的對華自由貿易條件；《望廈條約》的簽訂，標誌了「廣州體制」（即集中對外貿易於廣州，不許洋人進入中國）的結束，而緊接的經濟衰敗，揭開了中美貿易更黑暗的一面：苦力販賣。

本書啟發了我對鴉片戰爭的重新思考。鴉片戰爭前全球政治環境異常複雜，而由西方建立的「現代國際貿易體系」亦逐漸成型（例如中英貿易產生了「匯票」這種有利於英人經商的發明）。科技、資訊和知識的不平等，令各地「土著」受到層壓式的經濟剝削；英美兩國之間的矛盾、國家運作模式、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不同，既決定了兩國對華的貿易模式（如帶官方背景的東印度公司營運並不靈活，導致美國商人得以進佔對華貿易市場），又左右了它們不同的對華態度與關係。清廷的自大和閉關自守，讓中國無從



《美國和中國第一次相遇：一部航海時代的中美交流史》
作者：埃里克·傑·多林
翻譯：朱穎
出版社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

掌握全球政局變化，分析其對中國的影響。現在我們到美國東岸旅遊，也許會參觀位於波士頓附近塞勒姆（Salem）的皮博迪·埃塞克斯博物館（Peabody Essex Museum）。這所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，以展出一座完整的徽州大院見稱，並有着悠長的中國藝術收藏傳統——尤其是廣州的外銷品。為什麼？塞勒姆曾幾何時是一個對華貿易的重要港口；到同樣值得參觀的廣州十三行博物館，你便會發現不少展覽圖片，原件便藏於此館。